

將技能帶回勞動研究的核心： 評三本面向社會大眾的勞動研究專書

黃俊豪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張立祥著，台北：游擊文化，2021年5月，256頁。

《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涂曉蝶著，台北：游擊文化，2021年9月，320頁。

《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謝嘉心著，台北：游擊文化，2021年11月，328頁。

台灣本土的勞動研究，對於勞動體制或工廠政體的討論長期居於主流的地位（謝國雄 2008）。此種立基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勞動過程理論，首要的關注是管理者或資本家如何透過工作現場中不同制度組合，來產生不同的壓迫與意識形態效果。相較於此，與生產相關的技能實作儘管不是完全沒有被提及，但通常是處於較邊緣的位置。¹ 整體來說，這種對技能實作議題的邊緣化，並不只出現在勞動研究中，在時常與勞動研究作為一體之兩面的產業研究也有同樣的現象。產業研究對作為台灣產業競爭優勢的生產彈性之討論，幾乎都聚焦於協力網絡的形態與運作邏輯，對於同樣可能提供生產彈性的技能勞動力卻鮮少有系統的處理。這種對技能議題的邊緣化，在產業研究領域一直要到 2010 年後，才有諸如鄭力軒（2011）、謝斐宇（Hsieh

台灣社會學第 43 期（2022 年 6 月），頁 179-187。

1 例如，張崇熙的碩士論文《技術的社會建構性質：一個玻璃工廠的個案研究》、侯念祖的博士論文《以工匠為師：對鹿港小木工匠的經驗考察》，以及黃俊豪的碩士論文《技藝產業的維繫與創新：后里薩克斯風產業的外包網絡》，是早期少數將勞動現場的技能實作置於核心位置的作品。

2014) 等學者的作品嘗試對這個問題領域進行拓荒，但在勞動研究領域中仍缺乏有系統的處理。

2021 年下半年，游擊文化陸續出版三本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勞動研究專書，分別是張立祥的《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以下簡稱《萬能店員》）、涂曉蝶的《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以下簡稱《失去青春的孩子》）、謝嘉心的《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以下簡稱《我的黑手父親》）。儘管這三本專書有著極不相同的田野對象，但不約而同地圍繞著技能實作的某些面向來建構其論述，都恰逢其時地對勞動研究做出了深化與積累。我認為這些作品在以下三個面向有助於勞動研究往技能實作的問題領域拓荒：首先是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其次是勞動現場中的技術，以及對技能的影響；最後是技能實作是否及如何影響工人的自我認同。

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

在晚近的產業與勞動研究中，技能形成議題其實已經積累相當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從制度論的視角討論在發展型國家階段之技能形成體制的發展與特徵，如鄭志鵬（2021）指出台灣作為一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其人力規劃不僅是為了滿足不同發展階段的內部需求，更是為了回應各種國際因素，從而形成依賴發展的技能形成體制。² 另一個則聚焦於在全球產業中處於後進追趕位置的台灣，如何在不同的部門中打造具有後進特色的人才培訓體制。例如：彭莉惠、熊瑞梅（2015）的研究指出高科技業製造廠商會依據自身在全球生產鏈中所處的位置是製造代工（OEM）或設計代工（ODM），進而相應地發展出後進追隨學習與後進追趕學習這兩種不同的人才培訓模式。林文源（2013）則聚焦於高等教育

2 除了鄭志鵬指出台灣技能形成體制在 1949-1986 年的依賴發展特徵外，林凱衡（2021）的博士論文也以企業中心觀點，討論 1960-90 年代間政府推動企業辦理職業訓練失敗的原因。

的實驗室中如何回應台灣產業的後進追趕特徵，從而培養出擅於複製技術，卻窮於創新的科技人。上述這些成果主要聚焦於生產現場以外的技能形成機制之形態與特徵，較少涉及生產現場透過實作來進行的技能形成，以及對生產現場內外的不同訓練機制及其相應的知識類型間之互動。

我認為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是這三部作品共同的核心關注。《萬能店員》認為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勞動過程理論所主張的科學管理導致工人去技能的觀點，³ 當代超商由於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數量和種類上都持續擴張，因此不僅不可能剝奪工人的技能，反而必須打造擁有多種技能、能夠應對多重任務的工人。然而，標準的作業與服務程序也同時被加諸於工人的日常勞動，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組合勞動」的工作模式，在其中，工人為了應對多重任務而習得的多種技能，變得瑣碎且貶值。《我的黑手父親》則提供了與《萬能店員》截然相反的技能生產模式，港都的拖車師傅從學徒時期開始就透過身體去熟悉工具與材料的使用，並在日後的職涯中，持續地透過生產實作來學習新的產品類型與生產訣竅，以形成極具個人風格的工作流程（手路）。該行業中黑手師傅的流動，也導致技術圈的出現，不僅特定產品類型成為特定區域的代表，甚至形成稱呼各項機具、工具與零件的共通語言。

如前兩部作品一般，《失去青春的孩子》也為讀者精心建構了美髮業建教生的勞動處境，但聚焦於建教合作這個連結教育與工作現場的技能形成機制，有助於作者進一步地指出兩者間的互動與扞格如何導致美髮建教生無法取得技能。如同拖車師傅，美髮設計也是一個需要透過從做中學來養成的專業，相較於學校專業課程中授予學生的入門基本技能，在髮廊透過實戰所取得的剪吹經驗才是核心的技能組成。然而，由於對建教生是否應該視同勞工的爭論，仍是模稜兩可，

3 此種去技能化的觀點在服務業通常體現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的現象（Ritzer 2000）。

使得建教合作實際上是圍繞著參與建教合作之廠商的缺工狀況而運作，因此，建教生在實習現場必須優先滿足那些無需工作技能的人力需求，導致技能學習成為一件必須視機遇而定，或需忍受另外自費及簽下不合理勞動契約等不平等待遇，才有機會做的事。

整體來說，這三部作品一方面對不同時期、不同產業之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機制進行具有經驗深度的重構，有助於後續研究者做更細緻且有系統的類型學建構與比較研究；另一方面也對技能形成過程中，不同形態的生產知識的生產／再現、交流、傳承、競合等做更多的討論，這有助於釐清隨著生產現場日益加速的機械化與數位化，在傳統的黑手師傅日益凋零，及其所掌握的默會知識難以積累之際，台灣廠商與勞動者嘗試將生產知識轉化成具體的圖象與文字來進行接軌時所遭遇的難題。

勞動現場中的技術以及對技能的影響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勞動過程理論是台灣勞動現場研究的主流。這個傳統通常將技術視為包含人、過程與機械等因素協作的生產系統，並且由於強調勞資間的結構性對立，習慣性地預設技術內部必然銘刻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社會關係，並且會對工人及其技能產生壓迫或意識形態效果。因此，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者在處理生產現場的新技術時，往往將之視為壓迫與剝削的象徵體系，很難更細緻地去處理技術作為一種物（object）所可能提供的機會與限制，以及工人如何可能透過對技術的組織與使用，來爭取更多的利益，或進行更具創意的抵抗。這種侷限所產生的影響會隨著生產現場所使用的技術之複雜程度提升，而有所放大。事實上，自 1990 年代以降，台灣的勞動現場不論是工人的生產實作，還是管理者的管理作為，都已經圍繞著機械化與數位化的加速擴散而重組，使得生產現場有了完全不同於 1980 年代的面貌。這不僅侷限於製造業，在金融、物流、零售等服務及後勤產業，也有著毫不遜色於加工製造業的變化。這意味著我們在處理 1990 年代以後的台灣勞動現場時，對於勞動現場的技

術，以及其對技能的影響，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

在這三部作品中，《萬能店員》與《我的黑手父親》對上述的爭論提供了一些看法。在《萬能店員》中，作者清楚地意識到不論是簡單或複雜，影印機、咖啡機、微波爐等機器和設備都參與了對超商店員的勞動日常之構築，使店員淪為鎮日窮於應對來自各種機器與人類需求的協調人角色。如同大規模生產的工廠中，管理策略所追求的理性化與效率目標被鑲嵌在機械設備的布局和建築規劃中，當代的超商為了提供有效地整合多種不同的商品與服務，以結帳櫃台為中心，將各種機器與設備配置在特定的空間中。不同的是，在大規模生產的工廠，工人的日常活動與工作節奏時時刻刻籠罩在輸送帶的高壓統治下，而在當代超商中，儘管為了幫助店員迅速上手，超商內的各項業務都經過簡單化，但持續增加的商品與服務項目，背後仍各有一套專屬的知識與流程，店員必須周旋在各種商品、服務、機器及顧客間，以調解各方的需求。這意味著店員對於工作的服務與執行有更多的判斷空間，哪些事可以緩緩、哪些事必須同時注意、哪些事需在時限內完成，都必須在工作過程中迅速加以判斷。此外，正是因為如此，當超商內的人力難以使服務達到總部的要求或客人的期待時，超商店員才有機會採取「讓機台故障」這種生產線工人無法採行的應對策略。

在《我的黑手父親》中，作者講述了一個因為車輛安全法規規定必須使用電子設計圖，卻對整個拖車產業的技能職位結構產生衝擊的故事。在拖車產業中，安排製造流程、計算所需工料等生產規劃都是由拖車師傅來執行的，且通常是以簡單潦草的圖紙紀錄來呈現。然而，政府在1997年以法令規定國內製造的車輛必須由合格廠商申請安全檢驗，其中一個項目就是車輛必須與電子設計圖完全一致，只要有所變更都需要申請許可。相較於拖車師傅的簡單草圖，電子設計圖除了需要呈現更多的製造細節外，也需要電腦繪圖的技能，遠非黑手出身的拖車師傅所能擔當。因此，具備電腦繪圖技能的工程師職位便進入拖車產業中。拖車師傅與工程師的衝突出現在以下兩個面向：首先，工程師通常是學校的工程教育出身，缺乏現場施工的經驗，這使

得圍繞著現場經驗來建立自我認同與評價的拖車師傅很難對工程師有正面的評價；其次，必須預先規劃好的電子設計圖，與拖車師傅強調保留一定彈性和容錯空間的工作慣習時常會有扞格之處。不過，儘管電腦繪圖這項新技術的導入，使得該產業的技能職位結構產生一定的變化，但拖車師傅所擁有的現場經驗仍在勞雇關係中掌握相當的議價能力。

在《萬能店員》與《我的黑手父親》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技術在生產現場中的導入、開發／二次開發、組織及使用等不同階段，都有可能促使生產結構往不同的方向變動，然而不論資本家導入新技術的意圖為何，掌握生產技能與現場經驗的勞動者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能夠抵抗新技術所帶來的生產結構變動。

技能實作與工人自我認同的互動

一般來說，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影響的勞動研究大多同意經歷相同勞動過程的經驗，會成為工人階級意識的來源。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相較於技能實作等工作的內在特徵，工作保障、監督模式等外在特徵對階級意識的影響更大（Vallas 1987）。吳乃德對台灣勞工缺乏工人意識的解釋也採取強調外在特徵的觀點：亦即在台灣，勞工一詞並不像在南韓一般，是個被國家與資本家聯手污名化的詞彙，因此台灣勞工比較可能認同自身在客觀階級結構上的位置，但卻很少認為自身與資本家處於敵對的位置，以至於缺乏階級意識（Wu 1996）。然而，不論是支持工作之內在或外在特徵的看法，都只提供了部分解釋，更忽略了勞動者在經歷勞動過程時的主觀能動性與採取策略性選擇的可能。

在這三部作品中，作者都嘗試將特定產業的勞動過程與勞動者主體性的建構加以連結。《萬能店員》認為在當代超商特有的組合勞動形態中，店員必須作為新的主體，亦即不斷對各方需求加以協調、溝通的協調人。然而，協調人本身並沒有任何真正的產出，僅是在各種機器與人的需求間周旋，這樣的勞動往往會使店員遭遇主體性危機，

出現經常性地被打斷，注意力、心智疲勞感增加，僅有低度的自我成就感等情況。

如果超商店員的主體性及相關的危機是其被動經歷超商勞動過程的結果，那麼《失去青春的孩子》與《我的黑手父親》則更進一步嘗試呈現，參與建教合作的學生與拖車師傅對產業之勞動過程的主觀理解和策略性回應。《失去青春的孩子》指出，儘管建教合作制度的設計往往指向性地篩選了學習成績低落、家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但將其視為弱勢的觀點，並無法完整地理解他們進入建教合作的意圖，以及他們在建教合作過程中所做出的種種選擇。事實上，參與建教合作的學生對於建教合作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一方面，他們清楚知道透過建教合作，讓他們第一次能夠掌握經濟能力，儘管這個掌握是如此的有限；而從建教合作中習得的技能與現場經驗，也讓他們具有一般生相對缺乏現場經驗的優勢。另一方面，他們清楚地看穿建教合作中的不合理與壓榨之處，忍耐、退出、異議都是看穿後的選擇，而不是無知的莽撞之舉。

《我的黑手父親》聚焦於拖車師傅自豪自身的技能，卻又認為子女不應該繼承工人身分的矛盾。首先，在拖車產業相關的行動者中，對於拖車師傅的評價、聘用及支薪方式等，都圍繞著師傅技能的優劣而建構。然而，如同台灣其他手藝產業，拖車師傅並沒有從技能中形成行會組織的集體力量，技能只成為個別拖車師傅追求職涯發展的利器。其次，在職涯中遭遇困境或產業轉型時，熟練的工人經常藉由個人所掌握的技能，採取創業或成為小承包商之類的出走獨立策略，這種策略選擇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分散化產業結構。作者在書中指出，相較於以往研究提到的黑手變頭家現象，拖車師傅更常採取「做師傅就好」的策略，反映了拖車師傅群體主動選擇停留在受僱身分的認份觀。在我過去對台灣薩克斯風產業工人的研究中，也有受訪者指出薩克斯風工匠群體時常會自我設限於「師傅格」，而無法成為真正的「老闆格」，這種技能工人對自身職涯發展與認同的自我設限，往往來自於技能形成過程的經驗，亦即嫻熟生產

製造，但卻對管理責任與能力感到陌生或缺乏（黃俊豪 2009）。最後，對拖車師傅來說，他們在台灣社會由農業轉向工業的階段，習得一身的技能，並且憑藉這個技能養家活口，這個技能是他們的立身之本。然而，隨著台灣社會再次由工業轉向服務業社會，經由正式教育取得的文憑構築了人們對「好工作」的想像：拿筆、坐在桌子前、室內吹冷氣不用外出曬太陽。這種想像使得他們即便認為工程師根本沒有真本事，卻仍然同意工程師才符合人們對好工作的想像。

小結

晚近十年來，工業 4.0、智慧生產等概念引發產業官僚與企業管理者的熱烈討論。這些概念強調透過由多個設備互聯而成的智慧系統，來蒐集與分析生產數據，以形成即時的商業或生產決策。許多評論家認為這些概念的落實會加速工人技能的貶值，甚至消滅許多能讓工人過上體面生活的技能工作。如果台灣的工業 4.0 在推動過程中，能夠多考量工人技能的運用，而非只專注於追求先進技術，將有助於避免走入灰暗的數位專制未來。為此，我們對於了解工作現場的技能形成、技術物與技能的互動，以及技能實作對行動者認同的影響等相關議題，有著比以往更加迫切的需求。我認為《萬能店員》、《失去青春的孩子》與《我的黑手父親》這三部優秀作品的出版，對此提供了良好的起點。

參考文獻

- 林文源，2013，〈打造科技、打造人：後進實驗室的追趕實作文化與人材培育〉。《文化研究》17: 159-214。
- 林凱衡，2021，《為何台灣的企業提供職業訓練的比例偏低？一個技能形成取徑的歷史分析》。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莉惠、熊瑞梅，2015，〈台灣製造業廠商人才培訓的制度分析：以高科技業為主〉。《台灣社會學》29: 43-87。
- 黃俊豪，2009，《技藝產業的維繫與創新：后里薩克斯風產業的外包網絡》。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力軒，2011，〈彈性專業化作為產業轉型途徑：以台灣遊艇製造業為例〉。
《台灣社會學》22: 157-196。
- 鄭志鵬，2021，〈依賴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重訪台灣工業職業教育制度的歷史
發展與轉變（1949-1986）〉。《台灣社會學》40: 1-46。
- 謝國雄，2008，〈從援引、運用、推新到挑戰：台灣勞動研究回顧，1973-
2005〉。頁 243-320，收入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
2005》。台北：群學。
- Hsieh, Michelle F. 2014. "Hollowing Out or Sustaining? Taiwan's SME Network-based
Production System Reconsidered, 1996-2011." *Taiwanese Sociology* 28: 149-191.
- Ritzer, George. 2000.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Vallas, Steven Peter. 1987. "The Labor Process as a Sour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Sociological Forum* 2(2): 237-255.
- Wu, Nai-teh. 1996. "Class Identity without Class Consciousness? Working-class
Orientations in Taiwan." Pp. 77-102 in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Elizabeth J. Perr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